

GONGZI
ZENGZHANG
DE
FAZHAN
JINGJIXUE
DAOLUE

胡景北 著

工资增长的 发展经济学 导论

61.3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

胡景北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

GONGZI ZENGZHANG DE FAZHAN JINGJIXUE DAOLUN

胡景北 著

责任编辑 金福林

封面设计 刘育文

出 版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

装 订 上海市双燕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3.875

字 数 97 千字

版 次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1049—120—2/F·90

定 价 10.50 元

谨 献 给

我在农村期间(1968~1977)结识的农民朋友们

自序

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是我近十年来在发展经济学方面的一点研究心得。十年前,当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讲授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时,我注意到,在阐述我国的收入分配和资本积累时,存在着很多基本的理论困难。譬如,为什么中国普通居民能够储蓄,就是一个理论上难以解释的问题。后来到了联邦德国,我进一步了解了国外的有关研究状况,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发现,发展经济学最大的局限之一,是它的以低生产率为基础的不变生存工资假说。这一假说似乎不适合中国的情形。同时,以发达国家的高生产率为背景的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也难以直接应用到中国。中国以及其他一些东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现象是,生产率虽低,但工资却呈现出增长的趋势。显然,如果我们不想把这一现象仅仅归结为政治因素的作用,我们就需要创造出一套新的经济理论来说明它。本书便试图在发展经济学的范围内,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解释东亚的现象,这就是本书书名所标示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当然,本书的模型还很粗糙,充其量只能算是新理论的“导论”,但如果本书能激起读者的兴趣,引发读者的批评,本书就达到了目的。特别考虑到,本书是我在德国期间写作的,由于资料条件限制,我无法大量参考国内的研究成果,而同时,本书又企图以国内情形为经验背景,所以,本书提出的模型,是否适用于中国,尚有待于读者的评判。

我把这本书献给我当年插队时结识的农民朋友们,不但是因为我对经济问题的兴趣产生于和他们的交往过程中,而且也因为

在离开农村以后的文字工作里，他们勤劳、朴实的形象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促使我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如果说，本书可能证明，中国农民在经济发展初期，可以比其他国家农民有更好的运气，即他们的工资（收入）能够上升，那么，这个运气也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我在本书里所做的，不过是从理论上对他们的实践加以若干总结而已。

我在北京大学师从过的胡代光教授和厉以宁教授对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他们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的校领导大力支持了本书的出版。在此，谨表示深深的感谢。

胡景北

1997年5月10日于上海

目 录

自 序

第一章	导言	(1)
-----	----------	-----

第二章	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7)
-----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7)
-----	-------------	-----

第二节	经济分类的人均收入方法	(15)
-----	-------------------	------

第三节	经济分类的边际收入方法	(17)
-----	-------------------	------

第四节	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21)
-----	--------------------	------

第五节	发展中经济的定义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建设 ...	(23)
-----	-------------------------	------

第三章	发展中经济的劳动市场和工资的上升趋势	(27)
-----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27)
-----	-------------	------

第二节	一阶级模型的假定	(28)
-----	----------------	------

第三节	农业部门的工资决定	(31)
-----	-----------------	------

第四节	农业和工业工资的共同决定	(35)
-----	--------------------	------

第五节	对工资上升结论的检验	(39)
-----	------------------	------

附录一	有关统计数据	(42)
-----	--------------	------

附录二	模型的证明	(44)
-----	-------------	------

第四章	人口变化和工资上升	(49)
-----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49)
-----	-------------	------

第二节	古典模型和刘易斯模型中的人口与工资关系 ...	(52)
-----	-------------------------	------

第三节	一阶级模型中的人口与工资关系	(56)
-----	----------------------	------

第四节	人口增长和工资变化的数学关系	(61)
第五节	人口增长情况下决定工资上升的条件	(65)
第五章	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	(72)
第一节	发展经济学中的资本市场	(72)
第二节	资本市场的模型	(76)
第三节	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的相互作用	(85)
第四节	结论	(95)
附录	模型的证明	(97)
人名译名表		(109)
参考文献		(110)

第一章 导 言

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尤其是实证的发展经济学,建立在著名的工资不变假说上。如果简洁地表述这一假说,那就是,在整个经济发展阶段上,由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始终低于生存水准,所以工资不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到生存水平之上;由于工资必须保证劳动者自身的再生产,所以工资又不能降低到生存水平之下;因此,工资将等于生存水平,并且始终保持稳定。尽管四十多年来,这个假说受到了许多批评,但它却一如既往地继续保持着它的效力。直到今天,任何人打算系统地讲授或者整理实证的发展经济学,都离不开这个假说。1992年,英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尔在编辑“发展经济学论文集”时,曾询问英、美各大学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师们,了解他们使用的参考书目。结果,他出乎意料地发现,除了像刘易斯关于剩余劳动的极少几篇文章外,各个教师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使用的参考文献。^①而刘易斯那篇关于剩余劳动的著名文章,正是用来提出和论证工资不变假说的。^②菲德莱甚至声称,战后的发展经济学,大部分是围绕刘易斯的这篇文章展开的。^③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但我们确实可以说,刘易斯的工资不变假说,是现代的实证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

① 参见拉尔,1992,第 ix 页。

② 参见刘易斯,1954/1958,第 400~449 页。

③ 参见菲德莱,1980/1982,第 3 页。

把迄今为止的发展经济学称作工资不变的发展经济学。^①

但是,战后发展经济学的实际背景,主要是拉丁美洲、非洲和南亚等地区的贫穷国家。^②建立和推动这门学科发展的学者,也主要是熟悉这些地区的西方经济学家,以及来自这些地区的学者。如果说,对于这些地区,工资不变假说还多少有一定经验依据的话,那么,对80年代以后才真正引起发展经济学家重视的东亚地区,工资不变假说就有点像天方夜谭了。在这里,不管从长期观察还是从中期观察,不管在资本主义的市场制度下还是在改革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工资呈现的主要趋势,都是上升或增长。进入90年代,东亚地区已经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显然,要理解世界经济,首先应当理解带动它前进的那个地区的经济,因此,解释东亚的经济发展,成了经济理论面对的最大挑战。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彼得·伯杰所说,就像搞美术的人应当到佛罗伦萨、登山的人应当到喜马拉雅山一样,研究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人应当关注东亚。^③而为了说明东亚的经济增长,我们必须说明东亚的工资趋势。这点的理由,不仅仅在于工资变化本身便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在于工资对经济理论尤其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意义。实际上,在发展经济学框架内,如果不能对工资决定方式作出一定的规定,我们便无法进一步解释经济发展。

在东亚地区,也许可以把工资上升趋势看成是统计学事实。对于这个事实,我们能够从许多角度来说明。首先,我们可以考虑干

① 在一般经济学里,也有人认为存在着一个工资不变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工资不变的经济。例如,卡尔多曾提出一个两阶段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型,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工资不变,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才是工资上升。对第一个阶段,他论证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生产率的增长不会带来劳动阶级生活标准的提高。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人均产量虽然有了巨大的提高,但实际工资呈现停滞趋势。这一趋势是资本主义演进的特征,……它表明,在资本主义演进的第一阶段,生产率尽管在增长,但还没有高到足以使工资高于生存水准的高度,……”参见卡尔多,1957/1960,第294页。

② 譬如,拉尼斯/费两人曾明确地把印度与巴基斯坦视为他们所研究的发展中经济的典型,参见拉尼斯/费,1964,第3页。

③ 参见伯杰,1988,第3页。

扰劳动市场的经济因素。在发达国家里,我们很熟悉这样的因素,例如工会的垄断作用、国家的最低工资法等等。在发展中国家里,这些因素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其次,我们可以研究非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对于一个经济体系内的工资运动,无疑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尤其可能在东亚地区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东亚地区悠久的“不患寡、患不均”的传统,显然在经济发展初期,能够成为抵制贫富差距扩大、推动工资上升的重要力量。本世纪 20~40 年代发生的中国革命、它在中国大陆的胜利以及它对整个东亚地区的影响,在其主导的方面,可能改善了工资劳动者包括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促进了工资的增长趋势。此外,在对其他国家工业化的历史有所认识的基础上,滋生起来的不愿意为工业化而作出牺牲的大众心理,在较迟才发动工业化的东亚地区,也可能成为工资增长趋势的心理学基础。

不过,非经济因素和干扰市场的经济因素,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东亚的工资运动实践,但却很难直接在理论高度上论证工资上升的趋势;或者说,它们能够说明工资不变趋势是怎样被扭曲的,但不能否定这个趋势本身在理论上的存在性。所以,它们也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刘易斯工资不变假说对东亚地区的理论适用性。要想不依赖刘易斯假说,而又同时说明东亚的工资上升趋势,我们便不能仅仅考虑非经济因素和市场的干扰因素。我们应当关心的,是怎样在纯粹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解释工资上升趋势。也就是说,怎样才能直接提出或者论证工资上升趋势,而无需在工资不变的理论基础上,加入其他因素来解释工资的上升。本书将在这个方向上作出努力。为此,本书将完全不考虑非经济因素和市场经济的干扰因素。

论证工资上升趋势,有两条途径:第一条途径是否定工资不变假说的前提,第二条途径则是在原有前提基础上,直接论证工资上升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我们先考察第一条途径。工资不变假说有

若干基本前提,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水准。如果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生存水准,工资当然就会相应地高于生存水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是经常变化的,工资当然也不会稳定不变。而随着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工资将呈现增长趋势。因此,我们只要提出,某一经济体系的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生存水准,我们便不难引出工资上升的结论。实际上,早在60年代,舒尔茨就试图论证,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其实是很高的,并以此反对刘易斯的理论。^①

不过,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下的命题是否成立,其本身主要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因此,要通过这条途径论证工资上升的必然性,就需要使用适当的经济计量方法,利用统计资料,测度某一特定经济体系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但这里存在着许多基本的困难。第一,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在某一特定的发展阶段,劳动边际生产率是低于还是高于生存水准,是一个难以解决的计量问题;现有的计量方法和统计资料,都具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无法为问题提供一个清晰的答案。而像舒尔茨那样,用农忙时短时间的劳动力紧张,来证明一般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第二,黄宗智曾从制度和历史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大陆的农业生产率问题。他的结论是,在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只是在本世纪80年代以后,才超越了生存水平。^② 依此推理,对整个中国大陆而言,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也许还继续停留在生存水准之下。不过,黄宗智的研究方法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总的来说,在东亚尤其是中国大陆地区,统计资料的质量、计量模型的选择、模型假设的确定等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基本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乎不可能希望从经济计量研究中得到明确的

① 参见舒尔茨,1964,第53页等等。关于农业剩余劳动的争论,可见帕格林,1965,第815~834页。

② 参见黄宗智,1990/1992,第11~17页。

结论。第三,如果一个经济不是在其发展的起点上,劳动边际生产率就高于生存水准,那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它总要经历一个大体符合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水平假设的阶段。而工资不变假说针对的恰恰是这个阶段,所以,除非我们能够证明,东亚地区的最初发展起点就很高,从经济一开始发展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就能够支持工资的增长,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否定一个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下阶段的存在性;进一步,在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我们就必须承认有一个工资不变的发展阶段。第四,从理论上说,一个经济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如果超过生存水准,这个经济便不再是发展经济学所解释的经济了。所以,放弃边际生产率低下的前提,我们就离开了发展经济学;因为,如果假设边际生产率比较高,我们就完全可以使用新古典经济学说,说明工资上升的趋势。

解释工资上升趋势的第二条途径,是在原有前提下,直接提出工资上升的假说或者论证工资上升的命题。但这样,我们就提出了改变研究范式的问题。按照这条思路,新的范式应当能够直接得出工资增长的结论,或者利用几个简单的前提,直接推导出工资增长的假说。新古典经济学便是一种这样的范式。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生存水平。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原有的假设前提之上,引出工资增长的趋势。显然,我们需要的新范式,是发展经济学内的新范式。所以,我们把它称作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本书便是建立新范式的一种探讨。

范式是一种理论结构,是从爱因斯坦所讲的“理想试验”中引出的推论。为了建立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范式,我们也需要一个纯粹的经济体系。因此,本书所谈的经济或者经济体系,指的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其中既无政府,也无工会或其他联合及垄断组织。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存在对外交往,市场的所有参与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他们不但了解自己的行为目的,也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些经济主体进行

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广泛和迅速地传播于他们之间,既不需要成本,在事件发生和个人了解它的顺序之间,也无需任何时间。显然,这是一个典型的新古典经济体系。要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研究这一理想的市场经济,我们还必须对它作出进一步的规定。这便是本书第二章的主题。在这一章,我们试图定义一个典型的发展中经济,并通过它来定义发展经济学。在本章里,我们不考虑日常所说的发展中国家概念。这个概念,是国际社会为了发放发展援助而提出来的,它所服务的目的,基本属于实际政治的领域。这样的概念,与发展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理论对象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迄今为止,理论上的发展中经济,几乎都是用人均收入水平定义的。例如,由钱纳里和斯里尼发桑编辑的著名的《发展经济学手册》,采纳了刘易斯的说法,^①把1980年时人均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国家,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②但2000美元或者任何一个人均收入量的标准,都只应当看成一种应急的说法,而不具有任何理论意义,因为我们无法证明,人均收入2000美元以上的经济和2000美元以下的经济,在譬如工资运动和经济增长方面,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所以,第二章将证明,人均收入指标不足以定义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发展中经济。具有这一功能的,是边际收入或者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要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个经济体系必须而且也只需要具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于生存水平,另一个是它能够储蓄。能储蓄才可能有积累,有积累才可能有发展,因此,第二个特征也是发展中经济不可或缺的。理论上说,储蓄的前提是人均收入高于生存水平。所以,一个发展中经济,又可以定义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低于、平均生产率高于生存水平的经济体系。第二章证明了这一种经济在理论上是存在的。

发展中经济的定义,对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

① 参见刘易斯,1984(1),第1页。

② 参见钱纳里/斯里尼发桑,1988,第1卷,第xi页。

意义。首先,它表明,边际生产率工资理论从而新古典理论对这一经济不再适用;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具有存在的理由。其次,它突出了工资也就是分配理论对发展经济学的特殊意义。显然,不说明工资决定问题,发展经济学就无法说明积累问题及经济发展问题。工资的边际生产率理论,最初虽然是为了对抗古典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而提出的,^①但在后来的演变中,这一点已经淡化。在战后的发达国家里,工资明显地高于生存水准。为了解释工资决定也就是工资在量上的决定如果不能使用生存水准,人们就必须另外发明一个支点。新古典经济学家发明的支点,就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而生存水准,则是古典经济学家和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传统的战后发展经济学家,为了解释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下情况中工资的决定所依据的支点,这就是所谓的生存工资。这里,我们理解的生存工资,是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工资只有全部用于当期消费,劳动者当期的基本需求才能得到满足时所出现的工资。^②由这个支点出发,他们又引申出了工资不变的假说。所以,为了建立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我们必须为工资决定寻找一个新的支点。

第三章探讨的,便是新支点的存在性问题。该章表明,在上一章定义的发展中经济里,平均生产率可以充任这个支点。为此,我们提出了研究发展中经济的一阶级模型。它和刘易斯模型的区别,在于它假定了农业部门内只有农民一个阶级,他们既拥有土地,又耕作自己的土地。而在典型的刘易斯模型里,农业部门有两个阶级,即拥有土地的地主和耕种土地的农民。假设耕地有限,人口众多,地主将会尽量提高地租,而农民至少在自己所得能够保证自己

① 参见克拉克,1931/1967,第64~65页。

②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尤其是刘易斯理论的拥护者,强调刘易斯的工资,不是生存工资。但他们同时又强调,在刘易斯的理论里,工资全部用于消费。参见例如菲德莱,1980/1982,第3~4页。显然,如果这两点同时成立,则劳动者一定有“过度消费”,即超过了基本需求的消费。但这一推论难以纳入刘易斯或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框架。而根据我的理解,如果刘易斯假定工资全部用于消费,他的工资便是生存工资。这也是我在本书里这样看待刘易斯工资理论的原因。

生存的前提下才会租地；农业以至于整个经济的均衡劳动所得即工资，将等于生存水准。但在一阶级模型里，农民无需缴纳地租，他们的所得，便是土地的总产品；他们的工资，便是他们的平均生产率。工业部门尽管按照边际生产率来确定工资，但是，由于农民只有在工业工资不低于因为他离开了农业而提高了的农业工资时，才可能接受工业的就业；而追求利润的工业资本家，也不可能向工人付出比这更高的工资，所以，工业工资以及整个经济的均衡工资，将等于由农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决定的农业工资。第三章证明了这种均衡工资的存在性。

新的工资决定模型表明，一旦经济开始发展，农民开始向工业转移，仍然留在农业部门的农民的平均生产率从而他们的工资就将提高。工业为了获得新的劳动力，也不得不相应地提高工资。所以，不管一个经济体系的发展起点多么低，不管它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上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多么低甚至等于零，只要它开始了发展，只要它保持着发展，工资必然就会上升。因此，利用一阶级模型，以平均生产率为支点，我们能够推导出工资的上升趋势，初步建立起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第三章还利用台湾省 50、60 年代的资料，证明了一阶级模型对于东亚地区是有实际意义的。

在第三章里，为了研究工资如何在一种纯粹状态下确定，我们排除了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两个重要因素。第四章和第五章便分别探讨这两个因素对工资的作用。假设人口增长仅仅发生在农业部门，工业的新增劳动力都来自于农业，在两阶级的刘易斯模型里，由于在发展过程内工资等于生存水平，所以，不管人口如何变化，工资都保持稳定，不受其影响。假定人口只能通过劳动市场，经过工资和劳动供求变动，才能影响经济的总产出，那么，在典型的刘易斯模型里，由于工资不变，人口增长对产量变化将失去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增长对经济体系的技术选择也没有作用，因为在工业资本家看来，不管人口是否出现变动，在事先给定的工资

水平上,他都能够取得他所需要的劳动力,因此,主要根据劳动和资本价格而定的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比例,将与人口变化无关。研究发展中经济的古典经济学家,则把工资直接当成人口的函数。第四章指出,由于现代计划生育技术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工资与人口增长之间,已经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人口变化,不再能直接地影响工资。但是,在一阶级模型里,如果人口增长,农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便将下降,农业以及整个经济的均衡工资也将随之降低。因此,人口增长能够通过平均生产率影响工资,而通过工资和劳动供求,人口变化又能够对产量施加影响。这样,在工业资本家的决策过程中,工资不再是个常量,而是一个同时由工业劳动需求影响的变量。资本家在决定采取什么要素投入比例即生产技术时,就必须考虑工资的变化和包括人口在内的影响工资的因素。不过,人口增长时,工资呈现下降还是上升抑或不变的态势,还取决于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规模。如果转移人口超过新增人口,工资仍然会在人口增长的同时继续上升;如果转移人口落后于新增人口,工资则会下降;而在两者相等时,工资将保持稳定。然而,即使转移人口超过新增人口,工资继续保持上升趋势,但只要出现新增人口,工资上升趋势就会比以前平缓。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向工业的转移速度,既取决于工资,也取决于工业新增的资本投入。实际上,没有新的资本,工业就不可能吸收新劳动力,所以,转移人口要超过新增人口,资本增长率必须大于人口增长率;但转移人口一旦超过新增人口,工资就会上升,因此,资本增长率简单地高于人口增长率是不够的,它必须远远地高于人口增长率。所以,第四章从对这些关系的研究中得出了结论,与工资不变的模型相比,在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里,资本积累更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接下来的第五章即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便是资本积累。在工资不变的发展经济学中,工资只够生存,资本积累则全部来源于利润。70年代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思潮,从根本上说,没有超越这个